

寻找中国人类学的世界观

演讲者：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演讲时间：2004年11月26日

演讲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会和在座的各位老师，你们盛情邀请，给了我机会再次来到这里进行学术对话。我是两个月前接到讲座邀请的，从那时起，我便已开始考虑到底要到这里来谈点什么。粗略算了一下，到10月份，我到北京大学工作已整整十年了，而十年之前，我也正好动笔写后来被编成《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的那些文字。借这个机会来反思那本习作，也许是个好主意。对此，我并不是毫不犹豫，不过，现在既然来了，也就不须迟疑，请允许我就那本书谈谈有关看法。我的意图是要利用这次讲座来与民大老师和同学做做交流，这样，我的讲座便不应超过40分钟，留下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在座各位评论和提问。

回头重阅《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我深感遗憾多多，悔不当初。要是硬要说这本书还存在什么可取之处，那么，对我而言，这一可取之处在于那本书代表一个努力，因是努力，所以也



许还值得给予一点鼓励。

在书中我尝试着通过自己的综合和自己对别人的综合的综合，来评介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留学生回国后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发生的变化。当时，我所想做的，是从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四大领域，也就是从亲属制度、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概述海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提出的主要论点。这里不拟重复那些述评了，我要简单讲的，更多地与那本书的某一不足之处有关。《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很显然，它文字粗糙，即使是已经过有名编辑的校正，还是留下了种种遗憾，原因全是在我个人能力有限而且行文粗糙。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学术内容上的，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那本书只涉及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末海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对 90 年代中期以后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状况没有给予评介。前一方面的遗憾大家都了解，我也就不在这里赘言了，我现在更关注的是后一方面的问题：到底 90 年代以来海外中国人类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做出了什么成就？

十年前开始写《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我是初生牛犊，胆敢对自己所知的一些东西加以概括。现在我的这种勇气遭到自己那种与日俱增的知识贫困状态的挑战，就让我顺着这个挑战说开去吧。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人类学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行业内涌现了大量值得关注的新作。国内这些年人类学的科研成果很多，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也一样，仅就我这里想集中谈的海外来说，成果丰富得使我自己只能了解其中的一些皮毛，对深层次的背景和观点，无法深加追究。沿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的做法，我要多涉及海外中国学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我排斥我们自己的研究研究，而无非是设想通过海外看中国，利用某种“陌



生化”，能使我们更易于把握问题。要说明的是，对这方面的成果，我还没有发表文章来概述，我只是形成了某种印象。印象中，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留学海外的人类学研究者发表的论著最耀眼，尤其是在1996到2000年间，一批留学海外的同人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特别是有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景军的《神堂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著作以汉人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各自的角度，反映和评论了前人所没有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当下中国乡村的道德与政治、历史记忆、急剧形成的社会变迁问题）。留学海外的青年中国人类学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其中包括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生所熟知的施传刚、翁乃群、王筑生、彭文斌、范可等同人。无论是汉人社区研究，还是少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成果都相当重要。1995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与《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同名的研究生选修课程。也就是从那时起，大量作品以不同形式问世。我是在它们出版后一段时间才得到文本的。当时又考虑到主要想评介已经过时间考验的文本，所以在书中我没有谈到这些作品。90年代以来留学生创造的海外中国人类学的新时代，我们该怎么理解？怎么评论？对于这些问题，我思考得不成熟，今天也就不多说了。今天想重点谈到的是另外一批海外中国人类学的作品，这些可以说是“非中国留学生”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是由外国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的人类学之作。

当我从大量的新作中挑选自己的“所爱”时，发现选出来的三本，都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这三本著作中，第一本是出身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美国学者James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Hevia 是芝大的一位历史学博士。因芝大历史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长期合作,二者结合的做法也影响到了 Hevia。这本书是 Hevia 的博士论文修改成的,书中主要探讨清初中西关系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与该校萨林斯教授关注的近代化世界中的文化问题息息相关。《怀柔远人》试图说明西方向世界扩张时与中华帝国的力量如何相遭遇?出现了的碰撞到底是什么?碰撞的性质是什么?这本书虽是一部历史学之作,但实际又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人类学之作,与人类学者长期关注的文化接触史研究异曲同工。这本书国内已有中译本,也已受到广泛关注,另外两本书在国内则还没有译本,但在我看来也都是一流作品。其中一本是 Laura Hostetler 写的《清朝殖民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民族志与制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该书主要关注百苗图,但也牵涉到古代已存在于中国的地图制作方法和清初得到极大发展的民族志。在书中,Hostetler 提出看法,认为与近代民族志的地图学勃发于欧洲同时,中国在清初的盛世也出现了精致的民族志和地图。从百苗图看,到清初,中国的民族志传统已经非常近代化了,这一点表明,中国与西方同时相当独立地发现了民族志对于殖民事业的意义。第三本书的作者 Angela Zito 是芝大的人类学博士,现在执教于一所大学的历史系,她所著的《编撰者的目光与皇帝的身体:18 世纪中国作为文本/表演的大祭礼》(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研究清代初期皇帝的穿戴和起居,通过对祭奠中皇帝着装、身体表现和仪式记述的研究,力图说明,满族入关后,也就是游牧民族的身体在“入关”之后,如何面对强大而有着漫长历史的华夏文明,如何把礼仪附加在自己身上,以皇帝的身体来表演一个庞大帝国体系。Zito 花了大量笔墨阐述了皇帝的“自我教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帝国、权力和文化的观念。该书在社会理论上接受了有启发的“后结构主义”观



念，所研究的礼仪是人类学以前从未关注过的。过去的人类学大多涉及“落后部落”的巫术和仪式，而 Zito 讨论到皇帝的衣装和表演，考虑到所谓“天下”的观念，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

海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做出的成就，自然不局限于我上面根据阅读印象提到的那三种作品。为什么非要选这三本书来说事？要承认的是，我之所以会比较关注这类书，也许还是因为这些年来自己更多地关注历史。不过，除了个人爱好之外，还是有别的原因在起作用。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还有其他方面的感受。这些作品对历史的把握，对特定制度和“心性”所做的“考据”，其精彩和深入程度，都让我觉得羡慕。

我这个曾经是留学生的人类学研究者，在海外做博士论文时，要面临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时，能产生一点独立思考就不错了。博士毕业后，暂时留居海外，为了养活自己，就要做配合课题研究。属于一种“依附人”，所做的所谓“思考”便难以不打上“依附人”的烙印，所做的研究也便难以不因应付课题而失去独立思考的色彩。我侧面了解到，写那三本书的作者都是比我早进入博士研究的，但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才得到博士学位的。在美国那个地方读人类学和历史学，所要耗费的精力是我们国内的研究生难以设想的。我们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时间的约定表面上是所谓“学制”要求的，实际上大多是由校房产处在做决定。我们要是不准时毕业，便可能给下一届博士留下宿舍条件方面的压力，这样我们都被要求准时毕业，准时拿到学位，以便为后来的学生留出床位。海外不同，学校不须义务提供住宿，博士生一般要等到自己和老师对论文满意以后才提出答辩要求。至少在美国，一般博士学位需要的时间是极其漫长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相形之下有点难堪。因为英国奖学金有



限，而急于毕业，在论文没有好好完成时，已提交答辩，与这三本书的作者不能相比。这些年闲暇时间多了，我才开始想一些“真问题”的。在想的过程中，这三本书引起了我的关注。这里我还想斗胆说，它们可谓是中国海外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发表的最重要作品，它们能为我们反思中国人类学提供一种可贵的参考，是深化中国人类学研究所急需的知识。

我把三本书的出处列在下面，要是有时间，大家不妨一起读读：

(1)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3)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t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ighteen—Century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三本书的内容，这里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详加介绍。不过，我可以简单地点到：它们从海外的视角为中国人类学寻找它的世界观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什么是世界观？在人类学的定义中，一般泛指特定社会对于自然及人在其中地位的传统看法。我这里的定义与这有关，但侧重指特定文化界定的世界。具体到那三本书，Hevia 的那本书谈的是乾隆时的中英礼仪之争，他所特别强调的是，礼仪之争实际是中英两种世界观的碰撞，是英国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观念的国际体系与清朝保持的朝贡式帝国想象之间的冲突。在近代世界观的规定下，英国使



团期待在双方平等的地位中进行利益交换，而与之不同的是，清朝则仍保持着接受朝贡的习惯。《怀柔远人》一书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指出，中国的天下观和礼仪制度其实也是近代存在的各种世界体系中的一种，并不是说只有英国的国际体系才是世界体系。借此，作者让我们反观了西方现代性中国家观念的历史特殊性。从阅读中，我们逐渐看到，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民族研究来说，这样的反思也是有意义的。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中，疆域显然不同于近代“国家”给它规定的意义，所谓“天下”便是指内部包括着大量“少数民族”和“国”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古代中国是一个世界。这对理解“民族”是很重要的。而 Hostetler 则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族志传统，早在波亚士为美国民族学局展开民族志研究之前一千年，中国人已经有了类似美国民族学局一样的研究机构，而且收集的资料更加丰富。所不同的是，到了清初，中国一样也要面对制图学和民族志的创新，与早期现代欧洲一样，必须接受历史规定的某种改变。Zito 的书也是关注 18 世纪中国的，因主要重视的是礼仪理论，故对这段时间的历史变迁做了相对薄弱的铺垫，将大量精力放在考察清初礼仪化的世界观是如何通过皇帝的身体和日常起居展示出来的。

我以为要理解那三本书，就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读。就它们内容说来，我大略记下如下几个要点：

1. 三本书研究的时段略有不同（Hevia 关注的是乾隆时期英国使华及相关事件，Zito 关注的是同一时期祭天大礼，Hostetler 则关注清初几代统治者在位期间的制图学和民族志），但在广义上它们都牵涉到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统治的 138 年；

2. 在这个时期，清统治者面临一些“主要矛盾”，包括（1）统治族群内部权力的分化和“多头政治”的制衡，（2）统治族群



与被统治族群之间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与文明化程度较高的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3) 对外与逐步成熟的欧洲力量之间开始发生的“国际关系”；

3. 三本书的作者关注的是清初统治者在构建“世界权力”和处理内部族群文化关系时采取的礼仪和知识方面的策略，从这些策略的考察透视清朝治理天下的隐秘过程；

4. 有关这些过程，不同学者的观点有不同，例如，Hevia 和 Zito 更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和世界观的传承，而 Hostetler 则更关注清代业已形成的与“现代世界”的密切关系及这种关系导致的文化趋同。

我的理解可能错了，但我还是愿意从自己的角度抽象地说，这些史学研究对海外汉学人类学研究是有贡献的，而且这一贡献是巨大的。

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那本书中，我归纳出 90 年代以前相继出现的社区、宗族、区系、民间宗教四种范式。其中，除费孝通等所倡导的社区研究法外，其他三种范式都强调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不过，在强调学科综合时，90 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论结合点，他们也都未能像上述三本书的作者那样细致地关注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形式。三本书都属于“后现代史学”的范畴。我不喜欢“后现代”这个概念，也部分了解到这些著作存在着一些资料和解释问题，他们并非没有引起争议。但是，这三本被称为“后现代史学成果”的书，依据的研究是扎实的，这让我相信“后现代”有一部分是好的。至少这几部书的作者已经为我们指出，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不同于 90 年代以前理解的文化界线明晰的中国。对我来说，这对人类学的民族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中，我过分强调了“中国”这个概念，忽



视了三位作者提出的问题。因而，我感到能从这些论著中看到自己所需要展开的进一步思考。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尤其是华南的人类学者仍然把民族史研究当作人类学研究的根本来看待。当时的我年轻气躁，认为少数民族研究不代表中国人类学。去了英国后，我从东南民族史研究转做汉人研究，坚信少数民族研究是有问题的。回过头来看，我感到那时的简单化倾向问题很严重，是对民族史研究的框框套套的“逆反心态”，本身并非完全合理。实际上，中国人类学中传统的民族史研究，其蕴涵的资源是值得我们珍惜的。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在古代的“天下”，文化是多元的，而且，古代的帝国把握着某些今日易于被错误地抛弃的处理文化关系的手法。借助民族史研究发现的丰富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国的国度中，存在着与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所灌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观念完全不同的观念。在 20 世纪初期，古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多元主义已被蔡元培、吴文藻等人关注到了，老一辈的人类学家曾为我们强调，我们不能像欧洲那样将民族认同与政治实体的区分完全对应。应该说，注视“一个国家何以兼容不同文化”，是中国人类学的传统关怀。这种关怀的存在使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者更早地重视人类学作为“民族问题”，设计出不同于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被用来对民族和文化加以分类和描述的手法，关键的概念就是“五服”。“五服”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展望“天下”的中心与边缘的层次化体系，使中心与四方蛮夷狄戎的“同心方块体系”成为政治地图制订准则，并且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来维持这个体系的完整性。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自从有了“五服”的观点，古代中国便也有了自己的人类学，这也许也是阅读上述三本著作的体会。我



主张依据“五服”代表的那一“同心方块体系”，来重新思索中国人类学的范畴。

你们知道，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当然不再是“同心方块体系”，而是深受西方“地球理论”和“国家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学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分为由内而外的三个“zones”，也就是分为三个区带，这三个区带分别是：

1. 作为最内圈的农村人文区位学民族志调查，这在燕京—北大所代表的“北派人类学”中占支配地位，实际是以《江村经济》之类的社区调查为中心的，中心追求是研究汉人农村，试图通过村庄研究去反映社会现实，去改造社会现实，对之实行“现代化”。我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和近来的几篇文章中概述了这批研究，也提到90年代海外留学生发表的一批著作在方法论上如何“扬弃”这批研究的传统。这一区带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区带”。

2. 作为中间区带的少数民族研究，数量极其庞大，其主要追求是对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社会形态、社会变迁做出了全面研究，从而服务于“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的制订与维持。民族研究的历史久远，在1949年前的“南派人类学”中得到更多关注，到30—40年代渐渐得到“北派”的“边政学”的介入，其涉及地域远远超过了农村的人文区位学研究，特别关注古代民族志资料。

3. 作为外围区带存在的，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以李安宅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类学者对海外进行了研究，这也是真正的异文化研究，他们不再满足于在中国境内寻找所谓的“异文化”，有的去研究印第安人那样的真正的“异文化”（如李安宅），有的去研究先进的欧美（如费孝通），有的去研究印度（如许烺光）。



光)。遗憾的是,海外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国人类学的最外围和最不发达的部分。

比较而言,核心区带的人类学研究,更多地受到海外归来和居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注;最外面一个区带研究仍然是最薄弱的;中间区带研究最为发达,但因此也是最不容易概括的,我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之所以没有提及这部分内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自己认识上的偏差,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间区带的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许多海外人类学家开始加盟,将自己的学术兴趣从第一圈转移到第二圈。尽管这些人类学家在指导中国留学生时曾经告诫他们不要像国内的民族学家那样研究少数民族而要注重研究主体民族汉族,但他们自己的研究兴趣却在改变,已从汉人研究跳到了少数民族研究领域。比如郝瑞(Steven Harrel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来从事的闽台地区的闽南文化研究的,在那个领域学有所成,但近年转而从事彝族研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得了奖的著作再也不是宗族理论方面的,而是像 Erik Mueggler 那本有关楚雄彝族的《野鬼的年代》(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以我之见,三区带的结构是传统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延续。核心区带研究的实际就是古代中华帝国境内的编户齐民人口;中间区带研究的则是那些编户之外的“化外之民”,也就是与帝国有远距离接触的那部分人群;最外圈的研究在唐代宋元时期至为发达的对海外诸夷的文献资料中能找到最多印记(需提到的是,海外“诸番”的文献现在被归入以“中外交通史”为主题的丛书中,中华书局出版了大量珍贵的校释本,但在我看来,它们也属于古代中国的人类学之作)。中国人类学对这三区带的研究,没有脱离古代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内包含两块关系,一块



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的经济关系，即与编户齐民相关的赋税—再分配关系，另外一块是在帝国与化外之民和海外“诸番”之间存在着的与朝贡礼仪相关的相对松散的主从——礼物关系。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区带即农村、民族、海外文化，基本上都可以在朝贡的权力——象征体系的覆盖下得到理解。

与古代中国世界观相关的一些看法，我最近做了一点初步的梳理，主要内容发表在《年度学术 2004》，题目叫做“天下作为世界图式”。从《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一书开始，到这几年所发表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我的想法还有一个连贯性，我以为中国人类学要对整体地理解中国，才能对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独到贡献。这个观点不排斥专门的个别的民族志研究，但确实比较强调历史的完整性。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人类学做出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不过，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礼仪文明、族群之间的关系结构（或萨林斯所讲的“文化的关系结构”）都尚未给予充分重视。值得庆幸的是，数十年来历史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等学科在这些方面已提供了丰厚的论述，这些论述应当引起人类学界同人的更多重视。人类学一向以自己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微观调查而自豪。微观的民族志诚然有种种存在理由，但倘若这些局部的调查不能与涵盖或影响它们的“大历史”关联起来，倘若它们将自己脱离于中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框架之外，而无法解释朝贡、礼仪、族群关系的深层结构及其现实影响，那么，它们便无法成为一门“中国的学问”。于是，我敢于断言，这些方面的总体探索，将成为中国人类学未来几十年的重要课题，只有当这样课题得到广泛重视时，我们才能声称为世界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无论是微观的民族志调查，还是宏观的历史或文化研究，都能观察到这些古代世界观的“场”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留下的印记。我们应尝试着对所观察到



的零星现象进行更宏观的历史进程的把握。我将这次讲座当成一种“invitation”，邀请大家参加到问题的探讨中来。

我就简单汇报到这，无非讲了个开场白，以下的时间留给大家，请多给予提问和指正。

讨论与提问

王建民（主持人）：王铭铭教授用短短的几十分钟提出了大问题，最后也邀请大家参与问题讨论。各位老师和同学有什么点评、讨论和提问都请提出，这样能引出王教授更精彩的观点。

潘蛟：我很欣赏《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这本书，对这本书也有过很高评价。我以为，王铭铭教授今天再次为大家提供了一条了解海外中国研究的捷径。对这，我们都要感谢。我的问题是，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来看，视角可能还可以是另一类的。李亦园教授这些人喜欢把中国人类学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凌纯声等人为代表，重视少数民族研究，在民族研究中体现出人类学的关怀。尽管这些关怀仍然停留在进化、传播等方面上，但它们是有意义的。北派则以费孝通等为代表，农村社区调查是核心，实际上做的是社会学研究，而研究者的目标也是“社会学的中国化”。近年来，我们把这些工作置换为“人类学的中国化”。其实，在我看来，以往蔡元培、凌纯声等人做少数民族研究，那才是人类学的工作，而费孝通等则在从事社会学的工作。由于中国当时的城市社会不发达，乡村建设运动备受关注，“社会学的中国化”才变成了“社会学的人类学化”。社会学后来也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原来的“社会学中国化”继续变为“社会学的人类学



化”。1949年以后，人类学、社会学传统曾都被迫中断，大家都从事民族研究甚至是原始社会史研究，学科关系出现了变化。从学科史上看，费孝通等人从事的社区研究传统更适合归入到社会学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中，他们从事的还是自己研究自己的工作，而研究“异文化”才是人类学的工作。然而，要看到中国内部甚至在汉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异质性。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人类学学科内部的“自我”与“他者”如何交织摇摆，以建立中国内部的秩序。这是听后的一点感想，不是问题。

王铭铭：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南北派之分，确是长期存在的，直到今天还有所影响。但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个区分被打破了。事实上，从那时起，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还有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都被调到民族大学从事民族研究。中国人类学从5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一个有停顿的民族研究时期。现在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者，重新出现了乡村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区分，而从1998年开始，我自己开始呼应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提法，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做了一点思考。我知道，不同的研究是有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社会背景。但我也主张，目前的中国人类学应将乡村、民族和海外三个区带的研究综合起来思考。

荀丽丽：我对社会人类学只是了解一点皮毛，但从我读它起我就觉得社会人类学（我不是说中国的人类学）是一门特别有“后现代”气质的学科。从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安德岛做研究起，他就已经赋予他的“异文化”以合理性。所以，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来说，社会人类学似乎要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前面。我觉得社会人类学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它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的研究来反观自己。但是另外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中国的人类学很难把“异文化”当成检视本文化的东西。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工作，都把少数民族的当成要被识别、被拯救的对象。它所追求的，是要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建立“多民族共同体”。现在谈“西部大开发”，涉及到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研究，我觉得这与50年代的做法是异曲同工的，还是在进化论的套路里面的走，并没有发展出什么“异文化”的观念，也谈不上“反思现代性”、“反思主流文化”。而今天您把中国人类学的历史提得那么前，说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那时人类学的核心理念是“五服”，我想“五服”的观念大概也是服务于一种权力体系的。那么，我想中国人类学现在最缺乏的是是不是要通过对“异文化”的了解来检视本文化？我的问题是，您为什么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要去恢复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本来面目？为什么要把中国人类学的历史提得那么前？而我以为，古代那样一种所谓“中国人类学”缺乏西方人类学那种批评和反思气质。

王铭铭：问题提得很尖锐。1998年以来，我也一直受说的问题的困扰。在我看来，今天世界的最大毒瘤可能是某些观念。那么，对我们约束最大的观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国家”的观念。当今世界引起纷争和流血的观念，大多与国家民族主义有关。人类学界在过去20年来一直介入于对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观念的批判、反思和历史谱系的梳理。与清理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同时，人类学界还参与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并发现国家民族主义与西方“世界体系”的观念是相互结合和相互建构的。我同意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世界体系”的世界化，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世界化是同步的。如此一来，我便特别强调要改换观点研究，主张在中国研究中摈弃国家民族主义的观念，特别



是主张在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中舍弃国家民族主义的观念。从宋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将自己的帝国体系或世界体系改造成民族国家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原因是我们本来就不不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体系。因而，我更主张将中国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来研究，反对将中国缩小成一个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从这个简单的观点出发，我说中国曾是一个天下，也是一个世界。于是，我就看了一些书，包括今天提到的那三本。我感到那三本书包含着一种历史的想象，这种想象对等于研究中东的学者对西方支配之前的“阿拉伯世界体系”的想象，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至于人类学，我认为这门学科一直在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加以双重反思。过去的人类学家注重研究“没有国家的社会”，就是因为反对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观，试图比较全面地看待人类历史。就我的理解而言，你现在想说的问题是：如果中国人类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这种人类学又不具有批评性，那还有什么意味呢？我的回答是，我虽然是反对国家民族主义的，但还有一种爱国情结；我很反感帝国主义行径，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可以找到处理世界关系更好办法，而这些办法都可以被我们用“朝贡”两字来概括。过去费孝通将这套方法概括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这个很精彩，但我觉得还是存在值得我们更深入挖掘的地方。比如，维持这种关系体系的机制是什么？过去探讨得不多。最近，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原因也在于他认为我们处理民族关系和文化关系的方法潜在着对世界秩序的贡献。但是，中国与西方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则说得不多。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人类学不仅要考察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而且要考察曾在漫长的历史对维持这一格局起到关键作用的礼仪——贡文明展开研究。这种文明模式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实质主义”（包



括军事实质主义），它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过度地强调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在想象和处理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关系时，更注重“礼尚往来”。在目前的条件下谈它，表面上缺乏“批评精神”，实质上恰是一种针对时事的反思。具体说吧，现在流行的社会科学观念都源于近代西方的“国家”观念，这导致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都将视野局限于分析国家和国家间事务的“细节”。这样做当然是务实的，但对所谓国家和国家间事务缺乏反思性把握，容易使人始终从近代才明晰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出发想问题。人类学这门学科，相对比较有“异文化观点”，可是“异文化”是什么？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特定地指“非现代文化”和“无国家社会”，其中“古代东方”无非是附注。在这些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知识，与西方社会科学是有反差的，人类学家利用文化的反差来提出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观点。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不同，还是在于从“非现代文化”和“无国家社会”的角度，反观现代文化和国家民族主义。

我并非朝贡和礼仪研究的专家，我想做的是理解专家的研究，在专家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某些观念。而我觉得这样做有启发，人类学或者说整个社会科学只有在脱离西方民族一国家观念的世界体系之后才能取得“进步”。人类的历史已经有了几百万年。我涉及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历史。不过，所说到的帝国体系，与长期存在于人类史中的“游牧社会”是一样的，都不同于国家民族主义。在两种形态中，人类都不需要护照。怎样通过人类学研究看到的人类史来反思“小人类学”中的近代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你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在何种程度上能脱离权力对它的支配？能成为“自主的探索”？我想，没有脱离人和社会的知识，但我们不要因此而否定知识的相对自主性，否



定学术探索的意义。至少，我们应认识到，知识的讲述，时常就是一种公共性的交流行动，是一种“去权力”的“权力”，对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有帮助的。至于我为什么将中国人类学史提得那么前，那只是因为要以“形容”来反讽出近代社会科学的自负。而这正是一种反思。要承认的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被表达为一种困惑：在驱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之时，我们能有多少思想是“非西方的”？在强调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之时，我们又何以能避免落入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我之所以强调“天下观”，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包含着一种难得的“混沌”，一种不同于秩序化的社会观的“混沌”。

时国清：我是一名学宗教学的学生，想向您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人类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在哪里？第三，请谈一谈海外人类学家对民间宗教、秘密宗教方面的研究？

王铭铭：我不认为存在着所谓“人类学的本质”。学科不是一种东西，只有东西才有本质，学科只是接近某一种事物的途径。大体说来，接近事物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阅读前人的文献，另一种是发展自己的方法。如果说人类学是什么方法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已经有了 150 年的理论积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还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志这样一种接近人这种事物的独特方法。这两方面构成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

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区别，我以为这两门学科在传统上曾有明确的区分。社会学曾只研究工业化社会特别是西方现代社会，人类学则曾只研究非工业化的、传统的原始社会。起初，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很分明：社会学研究西方本土社会，人类学研



究非西方海外社会。社会学是关于国家内部事务的学问，人类学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学问。在中国，社会学引进时，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的工业化过渡中。怎样研究这种过渡社会？单纯用社会学是不够的，所以，也用了人类学。当今世界上，学科间的相互借用，使学科间的区分很难再维持下去。比如，现在的人类学必须要借用社会学理论，因为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文化社会与文化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而现代化对每个民族的影响都很大，研究这些“变迁社会”，没有涉及他们的“现代性”，显然不可行，所以人类学家必须要参考有关社会理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社会学基本上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社会理论研究，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基本上是根据西方的特别是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来阐发的，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的构成原理；另一种则是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来做的“实证研究”，其目的是要用统计方法来建立验证假说、修整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型。人类学虽然也涉及到现代社会，但反对像社会理论家那样，主张社会是现代性的，认为人从有开始就具有社会性，你可以研究一个人或十个人，这不重要，你能够从局部来反映整体，而不必采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你可以用民族志的方法，即“用对小规模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这反映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也就是刚才提到人文区位学方法或社会学的中国化、人类学化的方法上。

关于当前的海外民间宗教研究，我的印象是比较混乱。国内经过10年的知识积累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我所介绍的有所不同。国外的“民间宗教”是指“folk religion”即“农民/民间信仰”，杨庆堃称之为“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观念”。国内的民间宗教研究主要是指对明清以来的秘密宗教活动的研究，通常较少涉及到单独的农民信仰。这与海外很不一样。



样，海外把后一种称为“秘密教派”(sects)研究，与民间宗教完全是两回事，国外主要的还是研究农民信仰而很少关注秘密教派研究。与前者相比，秘密教派有更严密的组织和活动，而农民信仰多按照农业的历法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民间世界观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要把概念和范围区分得严谨一些为好，如什么是民间？如何对此加以界定？此外，也要警惕西方研究中对“异文化”的想象，比如西方就往往将中国与农村、中国文化与农民文化相等同，但我今天所说的一切，目的可能也包括要指出我们的帝王而不是农民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马茜：我是一个本科生。刚才您说，国家民族主义和西方世界体系是现代世界的“两大毒瘤”。我认为这两者不能分成两块，因为他们都可以追溯到现代化或全球化的推进中，非西方国家产生对民族国家的诉求，作为对被迫卷入全球化的反抗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国家观念和帝国主义是相互作用的。还有您把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归纳为“天下主义”，我也特别喜欢张海洋老师说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中心，是一个以四海六合为边界的“天下”。但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同的，不同的阶段有血缘分族或文化分族。当时也有“民族主义”的存在。潘蛟老师说，在历史上雍正是天下主义的，后来的帝王就变成民族主义的了，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天下主义”可能是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是可变的。

王铭铭：你证实了本科生是厉害的一族。我觉得你说得很好，也赞同你的第一个观点，这就是认为近代世界的国家民族主义与世界体系两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如果没有一个世界体系来维护平等的主权就无从谈起国家民族主义。你的第二个观点我也



觉得很精彩，但并不完全同意。确实，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持续地统一，有过长时间的分裂，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并不一定永远是“天下主义”的，两个不同皇帝就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考究个人性、地区性、时代性的差异，我的意图是从大历史的趋势谈中国的世界观。要承认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一统的局面很少能够通过军事征服的方式达成，更多还是采用朝贡即礼物赠与和礼仪控制的方式。可是，不正是这种方式与西方帝国主义去分开来并具备了它的可爱之处了吗？

海力波：按照您的理论阐述，是否可以把人类学理解为一门对时空秩序和人群加以分类和界定的学科？中国当代人类学研究和民族政策民族识别的制定实施，背后似乎都隐含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西方学者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往往侧重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中国民族政策，这是否也是一个不足之处？人类学学科的建立是为民族国家服务的，现有的满足分类以血缘为判断标准，而古代则是以文化归属来判断华夷界线，相比之下，这是否是一个当代人类学的缺陷？

王铭铭：你完全可以对人类学的性质做这样的理解。而且，古代中国的文化观当然也会延续并且影响到人类学研究乃至民族政策的制定上，这也是我要说明的问题之一。当今民族分类的尴尬和不足，正说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处于现代和传统的交织的困境当中。我宁愿极端一点，只讲传统，先把西方的概念理论放到一边，把老祖宗的东西弄懂，再说。这样做是否忽视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呢？我认为没有。比如说，朝贡体系对现实的影响还有所表现，现在的民族政策有朝贡体制观念的影子，比如对民族地区在计划生育、就学上的优惠照顾，但对汉人就不一样，对海外就



更是另外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与现在无关的。另外，与今天有关的是怎样把民族关系处理得更好？有以为我们当今对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成功的判断往往停留在经济、政治层次上，还缺少对背后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分析，而实际上文化与历史传统也有珍贵的遗产。

杨玲：您在这三个区带的介绍中都没有提到人类学的都市研究，你能否给予说明？

王铭铭：在这三个圈中当然都包含了都市研究的内容。但城市不是区分三个区带的标准，我便没有考虑到，也没有专门介绍。但是你提的问题很重要，也许这三个区对城市的想象是不一样的，至于具体的差异，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我虽研究过城市，但不是个都市人类学家，对都市人类学与天下观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也没有思考，请你原谅。

马建福：请您谈谈中国人类学做海外研究的前景。

王铭铭：我认为这方面研究有巨大空间值得拓展。在国外的管理学院，人类学都要教“跨文化管理”这门课。在中国做生意，你不了解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就没办法做生意。我们的外交学院，人类学的发展空间也很大。过去的外交，只依靠对时事的把握，未来中国发展了，要外交，便需要从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其他国家。要达到这种了解，是需要人类学的。所以，我建议人类学可以在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中求发展。当然，这么说不是要将人类学庸俗化。实际上，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先创建学术自主的人类学，再去想象、推崇人类学的应用。我的观点依旧是这样。不过，你提的问题实在重要。在我看来，中国人类学除了研究乡村和民族之外，今后可以多做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几年前，我



曾在北大提出要开设“海外民族志”研究生课程，因种种原因，这门课至今还没开设出来。但过去几年，我的确是做了一点试验性的探索，如到法国农村做了一点短期调查，如写作像《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 2003 年版）这样的“海外旅行志”，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我想探索的不简单是填补海外研究的空白，而是想表明一个观点，即中国人类学实在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里试着运用中国的概念来解释“异文化”，不要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本本主义。

黄娟：对今后的人类学发展，您提出的天下和朝贡体系观念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铭铭：显然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个构想，能有什么影响，我不可能有一个答案。但我相信这些问题即将构成我们未来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自己也从自己的角度赋予了一定解释，我的希望无非是，在座的老师同学一起探讨，在未来产生一定的辩论和声音，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它到底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不过，我有时私下也想，这样的探讨比较重要，原因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沉浸在民族国家的自觉中，在建设新国家时渐渐忘却了我们历史上值得继承的另一部分遗产。进行这样的研究，也就是重新探索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时代的观念，其社会意义不言自明。

王建民：王铭铭教授今天的发言是对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已有研究的反思和批判。《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这本书集中在汉人社会的研究上，而没有讲少数民族研究，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今天王教授对这个不足做了补充。王铭铭教授通过前述三本书给我们说明了天下观的宏大视野，进一步还可以利



用“三区带”框架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海外中国研究加以探讨从而找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进程。这也使我个人有了进一步反思。中国学者一直强调按照更国际化的学科规范来做研究，这很重要，但我们同时也要有所警惕，不要使自己成为服务于西方学术的“文化打工者”，应该以开拓我们自己的学术为出发点，来考虑我们的研究。我感到，王教授今天的讲座对我们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很多启示，期待他未来能按照他的理论对更多的海外中国研究作品加以解读和分析，使我们对海外中国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他的精彩讲演。

